

# 本体诠释与中西哲学

## ——成中英哲学的本体架构与方法意识

李安泽

**【提要】**在当代新儒学和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运动中，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理论，以其本体与方法互涵、知识与价值互基的二元一体的本体架构，独树一帜，引人瞩目，堪称一个重要方面理论探索与创建的典型和代表人物。他的哲学理论创构力图为儒学和中国哲学的现代重建，奠定形上学的根基。而作为其理论核心和基础的本体诠释学，根植于中国哲学尤其是强调整体创生作用的易经哲学，同时汲纳现代西方哲学主要是诠释学、分析哲学的理论与方法，力图在传统哲学的本体框架内纳入现代哲学理性化的方法意识，进而衍生出其本体哲学的整体创生，一体多元，体用相涵互须的理论。可以说，成氏哲学是在世界哲学的宏观背景下对中国哲学尤其是易经哲学的一种创造性诠释，也是儒家哲学现代重建的一个重要的理论创获。

**【关键词】**本体诠释 本体架构 方法意识 中西哲学

〔中图分类号〕B262、B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952(2018)02-0032-07

### 一、本体学与本体诠释学

著名美籍学者成中英的本体诠释学是在中西哲学会通、融合的基础上的理论创构，也是对中西哲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一种重新整合与重构。显然，在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理论建构中，本体是一个核心范畴。他指出，“‘本’是中国哲学的中心概念，兼含了‘本’的思想与‘体’的思想。本是根源，是历史性，是时间性，是内在性；体是整体，是体系，是空间性，是外在性。”<sup>①</sup>鉴于一般人对这种将本体析而言之的说法及其深意，不大理解，成中英这样来解释：“本体是本而后体。本是根源，体是体系。本体是指宇宙呈现的生动活泼、生生不息的整体。具有时间性、空间性、生命性与创造性。”<sup>②</sup>成中英对此还有这样的解释：“吾人对‘本体’的意义，可以归纳出以下两点：第一，‘对象的意义’，即将‘本体’视为一种对象，是实在的东西。第二，‘验存的意义’，即体验的存在，

<sup>①</sup> 成中英主编：《本体与诠释》，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5页。

<sup>②</sup> 转引自潘德荣主编：《本体与诠释：贺成中英先生70寿诞论文专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年版，第55页。

是主观和客观同时结合的感受。”<sup>①</sup> 成中英在另外的场合，就此进一步阐释和发挥。本体被视为心灵主体与世界客体经过自我超越的历程所达致的辩证统一。本体是原始的存在，也是可以完成自我与世界的存在。主体与客体所共原为本，两者透过经验、知识与反思所形成的思想体系为体。“本体即是本与体的思维辩证与实践过程的结合。”<sup>②</sup> 成中英强调本体兼具主体经验与客体指谓的实存经验与理性结构的共同体，或者说本体兼具主体性、客体性以及二者的统一性，其实具有涵括中西哲学本体论而兼容一体的涵义。因为，他所谓的作为“对象意义的”本体，可以用来指谓西方哲学中的对象化的、实体化的本体范畴。而作为“验存意义的”本体，则可以指谓中国哲学中验存性的、非实体化的本体范畴。而成中英综合此两方面而言，本体具有根源性、整体性、过程性和创造性等诸义。在一般的意义上，西方哲学的传统是一种理性化的本体论，惯于用理性化的概念思维探寻现象世界背后的真相、本原。与西方哲学这种实体性的、概念性的、静态化的本体范畴不同，中国哲学的本体则是一种非实体性的、非概念性的、生成性的范畴。可以肯定，成中英哲学的本体观，根源于中国哲学的传统，却又表现出融合中西哲学的趋向。成氏所谓的本体，既是作为根源性的、活生生的宇宙本体，又是据此产生的知识体系。两者合而言之，本体就是宇宙的本源及其衍生的宇宙生命的整体。可见，成氏关于本体的观点，根源于中国传统哲学对于宇宙和生命本源的理解，尤其是作为中国哲学源头的易经哲学；同时又尽力融入西方哲学理性化、概念化的本体的观念，进而冶为一炉，一体兼容。

简单地说，本体诠释学就是本体学与方法学的结合、融合。“如何用人类的心灵与理性来表达及说明这一活生生的宇宙本体，就是诠释的根本问题，故本体诠释是以本体为本，以诠释为用的根本学问。”<sup>③</sup> 本体诠释学力图在中国传统哲学的本体框架内纳入现代西方哲学理性化的方法意识，表现出显著的综合与会通中西哲学的理论取向。就其根本精神乃至整体的思维方式来看，可以说它仍然是根源于中国哲学的传统。而就其基本的思维规则和运行法则来说，它又极大地汲取了西方哲学的思想资源，乃至已融入其中。概略言之，本体诠释学“既是一种本体哲学，同时也是一种方法哲学，更是一种分析和综合的重建（再建构）的方法。”<sup>④</sup> 具体而言，其本体意识主要是源于中国哲学尤其是注重整体创生思维的易经哲学，但也表现出笼罩、涵括西方哲学本体论的思想意向。而其方法意识则主要源于西方哲学，尤其是西方现代诠释学、分析哲学的理论与方法，同时又不失对传统中国哲学方法意识的反思和总结。本体诠释学就是在对中西哲学的本体论、方法论的分析、综合和批判、反思的基础上的一种创造性重构。本体诠释学的创构，缘于中西哲学传统的交汇与挑战。<sup>⑤</sup> 其实，它本身即是本体论与方法论的一种融合、汇合。鉴于中西哲学的传统偏向于本体论或方法论的缺失，成中英乃着力倡导一种在本体与方法之间相互融合、相互沟通的思想方式和理论模式。他力主在一种新的整体思维的框架内重新整合、统合本体与方法。本体诠释学即是面临着本体与方法之间相互排斥、相互需要的矛盾而提出的整体思考。在他看来，中国传统的易经哲学就是这种整体思维的雏形。他明确肯定，本体诠释学“根植于中国哲学观念之中，尤其是根植于强调整体作用的《易经》哲学之中”。<sup>⑥</sup> 受到易经哲学机体统一、体用相涵互须的整体思维的启发，本体诠释学乃力求本体与方法之间的融合、统一。而所谓本体与方法的融合、统一，也就是在整体的本体意识的统率下，以理解、认识宇宙全体生命和人类社会及其文化在根源性、整体性乃至时空性或过程性的统一性、会

① 李翔海、邓克武编：《成中英文集》第4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5~16页。

② 《成中英文集》第4卷，第88页。

③ 转引自《本体与诠释：贺成中英先生70寿诞论文专辑》，第55页。

④ 成中英：《论中西哲学精神》，东方出版中心1991年版，第70页。

⑤ 参见《成中英文集》第4卷，第1页。

⑥ 《论中西哲学精神》，第83页。

通性。也可以说,它是在世界哲学的宏观背景下,运用现代哲学的理性方法对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易经哲学的一种创造性诠释和重建。

## 二、本体与方法、知识与价值的统一

本体诠释学具有突出的本体意识与方法意识,它本身就是一种寻求本体与方法融合、统一的哲学与学问。本体与方法作为其哲学中最基本的对偶范畴,它们之间是一种双向的相互界定和规约又相互批评和决定的关系。本体意识与方法意识具有对应性,有什么样的本体意识就有什么样的方法意识,反之亦然。成氏哲学的本体意识根源于中国哲学尤其是注重整体创生作用的易经哲学,但又表现出涵容西方哲学的本体论思想的特征,就是要在整合中西本体思考的架构中树立和追求一种整体创生和多元开放的理论境界。本体诠释学的方法意识主要源于西方哲学尤其是现代西方诠释学、分析哲学的思想方法,它是对西方哲学理性方法的一种自觉的汲纳和总结,但是其中又涵摄了对中国哲学的方法意识的省察和反思。说到底,本体诠释学就是在本体意识的统率下对人类整体理性的一种整合与重构。其理论目标就是要通过对理论方法而主要是理性方法的自觉的反思和整合达到对整体性真理的认识和把握。因此,本体意识与方法意识之间,存在着一种理论的冲突和张力,而更主要的是一种动态的平衡和统一。

本体与方法的统一,是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一个重要的哲学洞见。他强调,本体与方法是一对相互界定与诠释又相互批评与决定的对偶范畴。它们之间虽然也有矛盾的、冲突的一面,但根本上来说则是统一的、同一的一体。本体不是静态的,而是一种辩证的结构。而方法则是一个求知的过程。两者之间具有一种动态平衡的关系。本体与方法的统一,大致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理解。在西方哲学那里,方法意识具有突出的地位,整个西方哲学传统的不断进步实缘于其方法论的不断突破。相应地,西方哲学主客二分的、概念化的、分析理性的思维方法也导致一种对象化的、本质论的、实体化的本体范畴的建立。相反,在中国哲学这里,本体论具有中心的地位。中国哲学是以本体论来统率和规范方法,方法意识并未脱离本体意识而独立存在。方法与本体是动与静的关系。本体相对于方法是静,方法相对于本体是动。同时,本体是隐,方法是显。一动一静,一显一隐,过程与结构互融,部分与整体相应。<sup>①</sup>与此相应,中国哲学的本体范畴衍生出一种以“天人合一”、“主客合一”为特征的本体认知精神,成中英也称之为“非方法论的方法论”。<sup>②</sup>本体与方法的融合与统一,还表明在本体与方法相互矛盾、冲突的情形下,可以通过二者之间的相互诠释和相互批评,进而建立起新的平衡与统一。在他看来,西方哲学的问题在于它以方法来规约本体而本体却逸出方法的限制,其失在于陷入局部而不能窥见本体之全。中国哲学的问题是以本体来规范和设定方法,因为缺少概念的明辨和分析,却陷于笼统不分的误区。他的本体诠释学就是为了整合本体与方法之间的这种矛盾、冲突和理论困难,进而实现新的统一。基于对中西哲学本体学与方法学的辩证关系以及两者相互矛盾又相互需要这一基本事实的深度省察与反思,成中英乃提示和标出根源于中国哲学尤其是易经哲学的本体意识,同时又汲取和采纳西方哲学特别是分析哲学、诠释学的方法意识,以此达致其哲学中本体意识与方法意识的融合与统一,重构本体哲学和整体理性。约略言之,他的本体诠释学可谓是中国哲学的本体意识和西方哲学的方法意识的辩证统一和有机结合。

知识与价值的统一,是本体诠释学的另一个重要哲学洞见。在成氏哲学中,本体与方法的统一和知识与价值的统一,是两个密切关联的命题。可以说,本体与方法的统一,内在地蕴涵了知识与价值统一的命题。他从本体诠释学对本体的阐释中,阐发了生命的本体含摄了理性与意志,复由此

<sup>①</sup> 参见《论中西哲学精神》,第68页。

<sup>②</sup> 参见《成中英文集》第4卷,第297页。

产生了知识与价值的活动。从一个整体性的观点来看，知识理性和价值理性作为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又统摄于统一的本体理性的架构，构成了本体理性之一体二元。知识与价值在本体层面的统一，还意味着这一原理对二者在现实层面的矛盾、冲突发挥引导、规范的作用。这说明，知识与价值的统一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动态平衡和过程。他力图通过对知识与价值的双向诠释与批评，来整合与还原人类生命本体之整全，并以此作为其会通中西哲学以及现代哲学重建的理论基点。在他看来，西方哲学主要是一套知识哲学，其缺失在于对价值和整体本体的把握不够。而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一套价值哲学，其缺失在于对知识与方法的轻忽。他主张，通过中西哲学的整合导向一种世界哲学的建构，从而实现知识与价值在新的基点上的平衡与统一。他尤其强调通过汲取西方哲学的知识和方法来充实和完善中国哲学，实现中国哲学的现代化。他认为，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就是用知识和方法来扩充智慧和精神，亦即用普遍的知识与理性的方法，来表达和适应现代人当前及未来生活之价值。成中英在对古今中外的文化传统的考察、反省中，肯定知识与价值乃是所有成熟的文化传统普遍具备的力量与要素，二者的协调与平衡是任何社会文化得以发展递迁的根源。知识与价值之间，乃具有内在的、整体的相对性，不应该相互排斥，而应该相互结合。因此，既要从事知识的层面去了解价值、批评价值，进而建立价值；又要从价值的层面来了解知识、批评知识，进而建立知识。<sup>①</sup>成中英力图从知识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双向共建中来重建儒学的整体架构，他甚至从原始儒学仁智并举的观念来为其现代儒学重构寻找理论依据。由此可见，知识与价值的统一是其哲学重建的基础和一条基本原则。

### 三、整体理性与方法学的创新

在成氏哲学中，理性具有核心的地位。理性的本体论也决定了一种理性的方法论的树立。成中英哲学的本体意识与方法意识源于对中西哲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传统的分析与综合。就方法论而言，成中英综合、整合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是易经哲学和西方哲学尤其是分析哲学、诠释学的方法论，从而形成一套独特的理性化的方法论体系。本体诠释学的方法论，乃是对西方哲学的理性方法和中国哲学的“非方法论的方法论”的综合和整合。它既是对中西哲学理性精神和理性思维方法的一种具有创发性的整合和综合，同时也是对中西理性思维方法在内涵和范围上的提升和扩充。

成中英对于理性和方法的认定和界说大多是以西方哲学为背景和参照的。他认为，西方哲学的方法均为理性的运用。“所谓理性，即为对真实的把握或认知能力，也是思想工具自身的推理与论证能力。在此一理性定义下，方法可视为‘理论理性’之动态存在，其目的及其存在在于沟通主体和客体事物，使主体具有对客体的认知和说明能力。方法意识和理性意识之突出，也就说明了西方哲学必然假设了（基于文化生活经验不得不假设）主体与客体的分离与隔绝。”<sup>②</sup>可见，在西方哲学中，方法意识与理性意识是密切关联的。而所谓方法，其实质也就是理性的应用所形成的规范和规则。他有时称西方这种以主客分离为特征的概念思维为“分析理性”。他认为西方哲学的方法概念含义有二，“（一）方法是一种规范，是产生秩序的衡量标准，如规矩之产生方圆；（二）方法是一种趋向目标，具有方向感的规则或法则，也可以说是一个或一组目的化、方向化和准绳化的规则或法则。”<sup>③</sup>综合言之，“所谓方法就是‘理性本体的概念化，应用于特殊目的而能有效运作的客观规范’。”<sup>④</sup>总之，西方哲学中的方法，是一套理性的、分析方法，其实质是以理性化的主客二分或概念化的方法，

① 参见成中英：《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236页。

② 《成中英文集》第4卷，第291~292页。

③ 《成中英文集》第4卷，第287页。

④ 《成中英文集》第4卷，第13页。

从而产生一套理性的规则或法则。在西方哲学中，方法论是独立的存在，对于本体论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相对而言，在中国哲学中，方法概念乃是隐然的存在，不存在独立的方法论。中国哲学是以本体规范方法，方法意识并未脱离本体意识而独立存在。中国哲学由本体决定方法意识，标示了一种天人合一或主客统一的整体理性的思维方式。由于中国哲学以本体论为中心的思维方式相对于西方哲学而言具有其显著的异质性特征，成中英乃称其为“非方法论的方法论”。<sup>①</sup>成中英所作的这种中西哲学的比较，其根本目标乃在于提升理性的层次，扩充其范围，整合中西理性而发展为一种整体理性，进而拓展出一套整体理性的方法论，使之可以涵盖中西哲学的方法论，又可以彰显二者，乃至可以通过中西哲学方法论的互诎互释，互相发明和发挥，从而将方法论拓展到世界整体哲学的层次和水平。

成中英在此提出世界整体理性的建构，是其哲学创构中核心的问题意识。就当前世界哲学的发展现状来说，这个问题的理论探索可谓初见端倪。成中英站在中国哲学的本位立场，对世界哲学发展中这一前沿性问题的研探，实具有开拓性的意义。在他看来，易经哲学为构建整体理性提供了一个原初的范型和雏形。也就是说，易经哲学的“观”的思维模式为建构世界整体理性的方法论提供了一个理论模型。易经哲学的“观”，乃是一种观察和理解人和世界整体性的方法论，实际上它既是一种没有观点的观点，也是一种包含所有观点的观点，具有极大的涵容性和统摄性的特征。同时，它还是一种结合客观性的“外观”与主观性的“内感”而达致主、客观统一性的“合外内之道”。<sup>②</sup>因此，易经哲学的“观”的思维模式成为他整合知识理性和价值理性、建构统一的整体理性架构的一个理想模型。他在阐释本体诠释学的认知模式时，提出了“观”、“感”、“思”、“悟”、“通”的五套认知模式。其中，“观”是一种最初步也是最主要的将外部世界和事物作为整体性经验的认识。“感”是相对于外部的经验而引起的一种主观感受。它是人的心智的一种内在觉知和能力。“思”是一种理性思维的概念化的抽象能力，它通过判断、推理以及分析、综合等形式提供了一套理性思维的架构。“悟”是一种思想上的跳跃、扬弃，通过对现实事物的否定、超越而达致对全体真理的把握。“通”则是将有关的部分真理和智慧，综合、整合为一个整体的认知体系。<sup>③</sup>可见，就他所说的易经哲学的整体理性而言，与易经哲学原初的整体直观思维方式，已有实质性蜕变和超越，实已涵盖和容摄了西方哲学分析性的理性精神，勿宁说是对易经哲学一种创发性的重构。他的本体诠释学的方法论，是藉助易经哲学的“观”的方法论模型，同时整合并融摄了西方哲学的方法论系统而成的。也可以说，他是以西方哲学的方法论为凭藉和参照，来构建中国哲学的方法论模型，并且设法将西方哲学的方法论融摄其中。本体诠释学力图容纳、含摄西方哲学的方法论，这一思路也清晰地体现于他对本体诠释学方法论在运作中的八个程序的阐释方面，这包括：现象化（现象学）→结构化（结构主义）→过程化（过程哲学）→语言化（日常语言分析）→逻辑检验化（逻辑分析）→理论化（科学哲学）→效果化（实用主义）→目标（批判理论）。<sup>④</sup>这样，西方哲学的各个流派的方法论都被本体诠释学所汲取并整合而纳入其方法论体系。

#### 四、本体诠释学与中西哲学

成中英本体诠释学的创立，一个重要的理论宗旨就在于为中西哲学的对立和冲突寻求和架设一道会通、融合的途径和桥梁。他力图通过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和双向的互诎互释，发现其间的内在

① 《成中英文集》第4卷，第287页。

② 参见《成中英文集》第4卷，第46~65页。

③ 参见成中英、杨庆中：《从中西会通到本体诠释——成中英教授访谈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554~586页。

④ 参见《论中西哲学精神》，第83页。

联系和整体秩序，进而新的理论基础上开拓新的世界哲学的理论架构。成中英以其整体理性的本体哲学架构为据，从中西哲学互诠互释的视域融合中，力图为中西哲学定位，并以此作为构建其世界哲学的出发点。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在实质上是本体理性的精神，而西方哲学则是分析理性的精神。两者相反而相成，背反实相须，共同成为建构中的世界整体理性不可分割的“一体之二元”。在此，成中英由其本体理性的形上睿识，通观中西哲学之全体及其发展，乃将中西哲学的融合与会通视为当然之理则与必然之趋势。

成中英对中西哲学的比较和定位，是运用比较哲学的方法，在中西哲学之间求其同异，再彼此互相诠释，最后趋向一个整体哲学的观念和系统。<sup>①</sup>他认为，西方哲学是以理性为方法，以知识为目标，力图通过知识的建构来了解世界，侧重于建立一个知识性的世界。因此，西方哲学本质上是以知识论为中心。与之相对照，中国哲学在本质上是价值哲学，侧重于对宇宙人生的价值问题的反思和探求。它归结为一种以生命经验为中心，以实现宇宙、人生、社会的全体价值为目标的价值本体。因而中国哲学导向一个价值性世界的建构。<sup>②</sup>归结起来，中国哲学趋于整体理性的精神，而西方哲学则趋于分析理性的精神。中国人强调整体思考，统一的观念和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非常突出。而西方人则是分析的、逻辑的概念思维，主客分离、神人分离的趋向很显著。<sup>③</sup>以此而论，中西哲学在现代出现对反的、对流的运动，也就成为自然的趋势。在他看来，中国哲学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哲学，但由于欠缺对知识作精微性与广大性的探索，其问题是如何在价值宇宙建立知识的问题。而西方哲学本质上是一种知识哲学，由于整体理性的缺失，导致生命价值的失落，其问题是如何在知识宇宙安顿价值的问题。在当代中西哲学走向一个世界整体理性和世界整体哲学的建构过程中，西方哲学趋于从分析的、理性的哲学转向价值化的、整体性的建构；与之相反，中国哲学则是从整体性的、价值化哲学转向注重知识和理性的概念形式。这恰恰表明中西哲学实乃相反相须的一体。中西哲学的融通既是必然的趋势，也是走向世界整体哲学的必要环节。

成中英力图从中西会通的世界哲学的背景下致力于中国哲学的重建和儒学的创新。他从本体理性统摄知识理性与价值理性的形上层面对重建儒学的整体架构，从而使儒家本体形上学兼具知识形上学和价值形上学两个层面，同时融为一体。成氏在其本体诠释学的理论建构中，努力将传统哲学的智慧与现代生活相嫁接、相衔接，力图实现知识理性与道德理性的结合与整合，将现代理性与传统德性统一、纳入到一个共同的理论框架中。他认为，儒学的现代重建，必须透过儒学的自我省思和批判的环节和步骤，还必须接纳和接受现代西方的科技知识的理性发展以及此一理性精神在现实的政经运作程序和运作方法，也就是接纳科学与民主的精神和原则。他对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疏通和整合，也主要是为中国传统哲学寻求一个知识性的理性哲学基础，以此导向一个知识性哲学与价值性哲学双向共建的整体性哲学的构架。他强调现代儒学必须认知现代生活的实体，将儒家传统的价值理想贯注于现实生活，也就是以传统哲学的伦理德性的精神为根基，同时开拓出容纳民主和科学的生活世界，从传统哲学和现代理性与知识发展的现代生活的衔接中，寻求一个新儒学理论系统的建立。要而言之，就是在传统的德性的价值哲学的基础上开拓出理性的知识哲学，或者是在知识的理性的基础上拓展出全体的德性、价值哲学。以此而论，当代新儒学的最高理想也可以说是仁学与智学并举，进而合而为一。<sup>④</sup>

成中英尤其注重将中国哲学的精神、智慧、理想和现代社会生活相结合，并终于凝结成其特具

① 参见《论中西哲学精神》，第10页。

② 参见《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第105~119页。

③ 参见《中国文化的现代化与世界化》，第113~114页。

④ 参见成中英：《合外内之道——儒家哲学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333~338页。

的德性与理性互动平衡、知识与价值相涵互生的机体哲学的理论体系。与一般现代新儒家诸哲力图从传统哲学的价值或德性本位的立场出发，致力于以此涵盖、统摄现代社会生活的诸多事项或领域不同。虽然他们有时也并不否认理性、逻辑分析在现代哲学中的突出作用，但往往只是以其作为实现本体的工具和从属的意义，故尚难摆脱传统哲学体用、本末的思维模式的窠臼。而在成氏哲学的理论架构中，本体与方法、知识与价值乃至德性与理性，都是具有对等性、交互性的“两行”和对偶范畴，因而也是对传统哲学理论模式的一个极大的突破。成氏哲学也因此能够与现实的现代社会生活建立起一种双向的对流和交互性的沟通的渠道，使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双向的互动和批评成为可能。这也是成氏以“新新儒学”自许而有别于以往新儒家或新儒学之根由所在。成中英还强调中国哲学的现代化应就现代社会生活的五个层面予以考验，即传播、管理、伦理、民主法治、文化建设等。他尤其对现代管理哲学与伦理学有着深入而系统的研究和独到的发挥，可以看作其本体诠释学理论在现实领域的两个主要应用。其基本精神就是要将其哲学的高度价值理想与现代社会生活实体结合为一体，从而成为其哲学重建的理论在现实领域落实的重要环节。

本文作者：哲学博士，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美国夏威夷大学东西方中心客座教授  
责任编辑：周勤勤

## **Onto-Hermeneutics and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 The Ontological Structure and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 of Chung-ying Cheng's Philosophy**

*Li Anze*

**Abstracts:** In the contemporary movement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contemporary Neo-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philosophy, Chung-ying Cheng is regarded as a typical figure for his Onto-Hermeneutics, in which ontology and methodology are mutually contained, and epistemology and axiology are mutually dependent. His philosophy strives to lay a foundation for modern reconstruc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Chinese philosophy. As the core and basis of his philosophy, Onto-Hermeneutics is rooted in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especially the Philosophy of Changes which emphasizes the holistic creativity. Meanwhile, his philosophy absorbs new methods of such modern Western philosophies as Hermeneutics and analytical philosophy, and seeks to integrate the rationalized methods of modern philosophy into the ontological structure of traditional philosophy. As a result, his ontological philosophy is characterized by holistic creativity, diversification within unity and mutual support between ontology and function. In a sense, Cheng's philosophy is a creative interpretat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especially the Philosophy of Changes in the macro-background of world philosophy.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chievement of Neo-Confucianism in the course of its modern reconstruction.

**Keywords:** Onto-Hermeneutics; ontological structure; methodological consciousness; Chinese and Western philosophies